

班固美学思想及

《汉书》人物传记研究

黑龙江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朱家亮 李成军 ◇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黑龙江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班固美学思想及《汉书》 人物传记研究

朱家亮 李成军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班固美学思想及《汉书》人物传记研究 / 朱家亮, 李成军著.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316 - 5051 - 5

I . ①班… II . ①朱… ②李… III . ①班固(32 ~ 92) — 美学
思想 — 研究 ②汉书 — 研究 IV . ①B83 - 092 ②K234. 10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5893 号

班固美学思想及《汉书》人物传记研究

Bangu Meixue Sixiang Ji Hanshu Renwu Zhuanji Yanjiu

朱家亮 李成军 著

责任编辑 张玉红 华 汉

封面设计 王 刚

责任校对 李 鹏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印 刷 哈尔滨太平洋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875

字 数 207 千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16 - 5051 - 5
定 价 22.00 元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网址: www. hljep. com. cn

如需订购图书, 请与我社发行中心联系。联系电话: 0451 - 82529593 8253466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451 - 82529347

如发现盗版图书, 请向我社举报。举报电话: 0451 - 82560814

目 录

第一章 班固文艺美学思想述评	(1)
第一节 班固的文学主张	(2)
第二节 班固对屈原的评价	(4)
第三节 班固对汉赋的评价	(8)
第二章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汉书》创作	(12)
第一节 班固的儒家学术思想	(13)
第二节 班固儒学思想对《汉书》的影响.....	(18)
第三章 班固的赋体文学观	(26)
第一节 对赋体文献的传承	(26)
第二节 关于汉赋的理论研究	(33)
第三节 关于汉赋文学价值的思想	(34)
第四章 班固及其《汉书·艺文志》的小说观	(42)
第一节 《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家	(43)
第二节 《汉书·艺文志》的小说观念	(47)
第三节 《汉书·艺文志》小说观的文学地位	(49)
第四节 班固及其《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家再析	(51)
第五章 班固对屈原的文学批评	(62)
第一节 人格批评	(63)

第二节 伦理道德批评	(66)
第三节 审美批评	(68)
第四节 班固屈原研究的文学意义	(71)
第六章 班固美学思想对《汉书》人物传记的影响.....	(78)
第一节 对儒学的批评与《汉书》的文风表现.....	(78)
第二节 班固的审美意识	(96)
第三节 《汉书》人物批评的总体原则	(100)
第七章 《汉书》人物传记的结构形态	(109)
第一节 整体构思的完整性	(109)
第二节 纪传内部的照应	(112)
第三节 谋篇布局的细密连贯	(116)
第四节 灵动变化的结构手法	(119)
第八章 《汉书》人物传记的叙事艺术	(128)
第一节 独特的叙述视角	(129)
第二节 独特的时空观念	(133)
第三节 叙述内容的虚与实	(140)
第四节 叙事的疏与密	(145)
第五节 叙事的概括与细微	(158)
第六节 叙事的个性化特征	(174)
第九章 《汉书》人物传记的语言特色	(182)
第一节 语言的丰赡雍雅	(182)
第二节 语言的明整凝炼	(186)
第三节 语言之冷峻与深情	(187)
第四节 谨严与风趣的特色	(196)
第十章 《史记》与《汉书》有关内容的比较	(203)
第一节 《史记》的文化背景	(204)

第二节	两汉之际经术思想之变及其影响	(208)
第三节	《汉书》的背景及创作	(211)
第十一章	《汉书》的史学与文化意义	(218)
第一节	体例方面	(218)
第二节	思想方面	(224)
第三节	文化方面	(231)
第十二章	历史散文进程中的《汉书》文学个性	(235)
第一节	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进程	(235)
第二节	《史记》文学的不可重复性	(238)
第三节	《汉书》文学个性概述	(242)
第四节	《汉书》对后世的文学影响	(249)
参考文献		(259)
附录	班固年谱	(265)
后记		(277)

第一章 班固文艺美学思想述评

班固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有着系统文学思想的文学家。而儒家的文艺观又是其文艺思想的主体和核心，在阐述传统的儒家文艺观时，他特别注重结合汉代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作比较深入细致的评论，因而，班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他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主张文学应发挥其社会功能，起到政治教化的作用。班固对屈原、司马迁及其作品的批评，体现了他文学思想中正统的儒家文学观，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对汉赋的评论中，班固的文学思想充满着矛盾，那就是浓厚的儒家正统观念与严谨的史学家、审美的文学家的矛盾。

在东汉史学界，班固无疑是居于领袖地位的，同时又是文坛巨将。他出身于世代显贵、遵奉儒学的官宦书香之家，这对其儒家思想的形成和继承家学渊源有极大影响。他又参加了汉章帝亲自主持的白虎观会议，并主持编纂《白虎通义》，这又使其正统的儒家思想染上较浓重的谶纬神学色彩。

汉代，自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学占据了正统的思想地位。《诗经》被奉为典范，《诗大序》《礼记·乐记》强调儒家的诗乐理论，扬雄高举起明道、征圣、宗经的旗帜。这样，汉代的思想

家、文学批评家总是以儒家经典为标准评论作家作品和各种文学现象，凡符合经典者，便受到肯定赞扬，凡不合经典者，便受到否定批评。这就是汉儒论诗论文所坚持的“依经立论”。若说扬雄在“依经立论”方面恪守遵行的话，那么，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扬雄文学思想的班固，则把“依经立论”推向极至，其思想中，有合理的成分，又表现出许多消极保守，甚至神学迷信的东西。

作为一个严谨的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在阐述传统的儒家文艺观时，有不少新的发展，特别是结合汉代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评论，进一步丰富了儒家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班固有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他的文学思想和主张主要见于《汉书》的人物列传和文学家传赞及《两都赋序》《离骚序》等文章中。

第一节 班固的文学主张

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强调。班固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主张文学应发挥其社会功能，起到政治教化的作用。班固的这一主张体现在对《诗经》和汉乐府诗的评论中，对儒家传统观念有新的发展。《汉书·艺文志》评论《诗经》说：“故哀乐之心感，而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班固认识到诗歌是人民哀乐之情的咏发，可以反映社会风俗的盛衰及政治的得失，统治者可以发挥诗歌的认识作用，匡正行为和政策的偏狭。在《汉书·食货志》中，他先引用了《诗经·七月》中的几句诗，然后总结说：“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认识到民歌大都是下民百姓有感于现实生活的遭遇而发出的歌唱，强调了

民歌产生的现实基础。后来何休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进一步概括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正是对班固这方面思想的具体说明和解释。班固不仅看到了现实生活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而且以其独特的视野，率先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诗经》予以阐释。《汉书·地理志》指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清醒地认识到不同的自然环境、民情风俗对文学艺术风格气质的影响。十五国风各有自己的特点，而这都是与各国不同历史、社会风尚、自然条件有关系的。在评论汉乐府诗歌时，班固着重肯定了其现实主义精神。《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在班固看来，汉乐府民歌是劳动群众的歌唱，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这种哀乐之情均是由现实生活的感发而产生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地现实主义思想启迪了汉魏以后无数文人的创作，成为杜甫、白居易新乐府创作和批评的艺术指南。

不过，班固并没有始终坚持这一进步的文艺思想。在《汉书·礼乐志》中，他一再提到古代圣人创造的音乐，这种圣乐似乎不是源于现实，是圣人随心所欲创造出来教化百姓的。更有甚者，在《白虎通义》中，他提出：“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这完全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神学观点，与上述文学主张形成矛盾和对立。和扬雄一样，班固的文学思想也充满了矛盾的复杂性。从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出发，班固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的政教意义。

班固认为，诗歌的作用是：“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音乐的作用是：“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由此，班固进一步把文学

的社会功能归纳为：有“补于世”，“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其言有补于世”。自从《毛诗序》将文学的功用推重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高度，文学便与儒家政教理论联系在一起，成为儒家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班固以“有补于世”来要求文学，强调文学对政治、对现实、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要求文学有益于家国、有益于世道，发挥其社会功能。这是“有补于世”的积极意义。但是必须同时看到“有补于世”的文学观有着严重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一味强调文学直接的社会作用，将文学视为宣传政教的工具，甚至沦为政治的附庸，就势必削弱了文学的独立地位，忽视了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这是不利于文学的独立和发展的。

第二节 班固对屈原的评价

自《楚辞》诞生以来，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论，就已经随着《楚辞》的流传展开了。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论也构成了两汉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是两汉文坛争论的焦点。

从西汉开始，刘安、司马迁首先对屈原的人格及作品做了全面肯定，继之扬雄、班固对屈原及其作品多有贬损，最后王逸对屈原做了总结式的批评，肯定了屈原的为人及作品价值。

作为一代醇儒，班固从儒家正统立场出发，“依经立论”，对屈原及其作品做了异常激烈的批评。其《离骚序》云：

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

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怒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可以看出，班固是从两个方面着眼来贬损否定屈原的。一方面，按儒家传统诗教，文学发挥讽谏作用时应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班固对此恪守遵奉，进一步发挥引申为“以礼谏君”，“辞顺而意笃”。屈原在《离骚》中却怀着强烈的义愤抨击浊世，“责数怀王，怨恶椒兰”。就其抒情而言，发乎情，却未止乎礼，不合温柔敦厚的诗教；就君臣关系而言，不合“以礼谏君”的礼教；就其为人而言，不合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所以班固贬斥屈原是：“狂狷之士”，非明智之人。另一方面，班固以《诗经》的创作方法为唯一标尺来衡量《离骚》的艺术手法和浪漫主义精神，指斥屈作是：“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以儒家务实功利、求真求实的文艺观批评充满神话色彩的浪漫主义文学，只能是采取排斥的态度。可见这种“依经立论”的批评方法不仅使班固的眼界显得保守消极、平庸狭隘，而且也使他在把握文学本质特征方面显得虚妄无知。最后班固认为刘安、司马迁对屈原的评论太过了，“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固与刘安、司马迁的分歧，既是道家愤世嫉俗与儒家维持现状的思想观念的分歧，也是汉代文艺思想发展中进步与保守之争。

但是，班固对屈原《离骚》并非全部否定，表现出深刻的矛盾性。他在给东平王刘苍的《奏记》中说：“昔卞和献宝，以离断趾，

★★★

班固美学思想及《汉书》人物传记研究

灵均纳忠，终于沉身，而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这种推崇与赞扬较之刘安、司马迁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离骚赞序》一文中，班固进一步肯定说：

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是时周室已灭，七国并争。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怀王。

班固同情屈原的遭遇，认为屈原遭受了忧愁和不平，满怀“忠诚之情”而作《离骚》，肯定了屈原的为人及作品。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也曾赞赏肯定道：“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不仅认为屈原是“离谗忧国”，而且将屈原与大儒荀况并列，认为屈赋合于儒家经典之义。班固这种自相矛盾的思想观点令许多人费解。以至于在此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聚讼不已的公案。他曾提出文学：“宣上德而尽忠孝”的原则，他之所以如此高的评价屈原及其作品，大约是屈原作品中时时流露出强烈的“忠孝”、“纳忠”思想的缘故。但是当他意识到屈原“不忍浊世”而“责数怀王”的义愤是不合于人臣对君主应用的态度时，就自相矛盾地对屈原作出了否定的评价。

班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体现了他文学思想中正统的儒家文学观，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他的这种批评意见同样表现在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评论上。在《典引序》中，班固转引了汉明帝对司马迁的评论：“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

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明帝认为司马迁敢刺讥当今天子，是违背人臣礼数的，所以他以为司马迁“非谊士”，司马相如的贤德远在司马迁之上。对圣上的意见，班固诚惶诚恐恭维道：“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班固以为汉明帝对司马迁的贬斥是连孔子“亦无以加”的“圣论”。这其中不乏人臣的吹捧和谄媚，但也道出了班固的真实内心。司马迁惨遭宫刑，发愤著书，“刺讥”、“贬损”强烈而深刻。从儒家礼教出发或从君臣礼仪出发，均属大逆不道，从儒家诗教出发，更不合温柔敦厚之旨。而且司马迁高度评价了被班固称为“狂狷之士”的屈原，认为屈原其人其文“与日月争光可也”。凡此种种都会使班固赞同司马迁“非谊士”的结论。

同对屈原的评价一样，班固对司马迁的评论也存在着矛盾。在《汉书·叙传》中，他这样评价司马迁：“呜呼史迁，薰胥以刑，幽而发愤，乃思乃精，错综群言，古今是经，勒成一家，大略孔明”，这是在同情和惋惜司马迁的不幸遭遇，赞扬他“幽而发愤”的创作精神，高度肯定《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成就。

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同样是基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其批评较集中地体现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呜呼！以迁之博物洽

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在这里，班固依旧从儒家正宗思想出发，批评《史记》的指导思想不合圣人经典，“是非颇谬于圣人”，“此其所蔽也”；又与批评屈原一样，用“明哲保身”这种迂腐、庸俗的观点批评和指责司马迁。然而正由于司马迁没有恪守儒家原则，时或背离圣人经典，才能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作出超越世俗之见的科学评价，这恰恰表现了司马迁历史观中的进步因素。这是作为历史学家的班固无法接受和理解的，也是无法企及的。在批评批责的同时，班固又采用了刘向、扬雄的观点，肯定和赞扬《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盛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材”。班固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的这种矛盾，是儒家文艺思想本身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的矛盾反映，是班固遵奉“依经立论”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第三节 班固对汉赋的评价

与唐诗、宋词、元曲一样，汉赋是汉一代文学的主要形式，是有汉的“一代之文学”。汉赋是汉人崇尚“靡丽”、“侈丽”、“弘丽”的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因此汉赋的美学特征若用一个字来概括便是“丽”。汉人对汉赋的批评多从儒家尚用的文学观出发，指斥汉赋“文艳用寡”“丽以淫”，司马迁如此，扬雄亦如此。班固是汉赋的重要作家，对汉赋的批评与前人不同，他与扬雄虽都是从儒家尚用的文学观出发批评汉赋，但两个角度不同，结论也不同。

班固以为汉赋尽管有宏丽、侈丽等外在修饰特征，但在反映大汉帝国繁荣昌盛、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他在《两都赋序》中对汉赋作了总体评价：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乘、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大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在此，班固对汉赋是做出了全面肯定的。班固为何对汉赋情有独钟，全面肯定？《诗三百》在汉代被奉为经典，汉儒诗便持美刺两端，认为一部《诗经》就其内容而言或是赞美或是怨刺，由此汉儒认定文学的功能或是美化褒奖，或是怨刺讥讽。班固认为众多的赋家赋作就是承接了《诗经》雅颂之传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即可以对统治者发挥讽谏怨刺作用；“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即可以为大汉帝国歌功颂德，盛赞帝王的文治武功。所以班固肯定了汉赋“润色鸿业”的作用，认为汉赋的地位是“雅颂之亚也”，“炳焉与三代同风”。

对于汉代其他赋家，班固也做过一些具体详实的评论。

对司马相如的评价。在《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中，他评司马相如说：“司马迁称‘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可看出班固不同意扬雄晚年对汉赋和司马相如的否定批评，借司马迁之口说汉赋“与《诗》之讽谏何异？”在《汉书·叙传》中，班固再评司马相如：“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班固以为相如赋的重要特征是文辞赡富华美，似用处不大，但在艳丽的辞藻中仍寓有讽谕之效，而且相如赋可以增加读者的自然知识，具有值得观赏的审美价值，因而相如就成为赋史上的“辞宗”，对司马相如做了全盘肯定。

由于指导思想和具体创作实践存在的矛盾，班固的文学思想充满着矛盾性，所以在文学批评中常常是前后不一，上下相违。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他先是肯定荀赋、屈赋的价值，随后指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有风喻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这种评论与上述对汉赋的肯定大相径庭。从辞赋发展史来看，屈原之后华美的辞藻愈来愈淹没了讽喻之义，所以班固才感叹汉代赋家“没有讽喻之义”。但在具体分析评价赋家赋作时，班固发现不少赋作仍有较强的讽喻之义，值得肯定赞赏。这大约就是班固产生上述矛盾的原因。究其实质，仍是他以儒家讽喻功能为标准批评文学产生的抵牾。

汉代从司马迁开始直到班固，一批颇有影响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对汉赋作了或褒或贬的诸多评论，但其出发点和归宿均是“依经立论”。以是否有教化、讽谏、颂圣等功利标准来褒贬汉赋。几

乎无人对壮丽宏肆的汉赋做艺术和审美的深入分析,也无人理解汉赋作为一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这实在是汉赋的历史悲剧。

班固的世界观是非常复杂的,其文学思想也是复杂的,其文学批评自然表现出矛盾的复杂性。班固有着浓厚的儒家正统观念,尊孔重道,以圣人之言和儒家经典为评判事物的标准,这使其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带上官方和正统的色彩。当他以正统的经学家的眼光批评作家作品时,便时常发出带有保守消极色彩的言论;当他以严谨的史学家、审美的文学家的眼光来看待作家作品时,便间或有精彩警策之论。遗憾的是班固很少以审美的文学家的眼光来批评文学,他维护的是君王的权威,遵循的是儒家的典则范式。班固文学思想的矛盾既是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也是时代风习所染。